



现代性视域下社会话语与女性意识的表达研究 ——以《玫瑰的故事》为例

冯青青

(四川传媒学院, 四川 成都 611745)

摘要: 当代女性题材电视剧是观察社会性别观念演变的重要文化文本。《玫瑰的故事》以都市女性黄亦玫的成长经历为主线, 呈现了当下女性自我意识的表达方式。本文从叙事方式、身体呈现和职业想象三个角度分析该剧的话语建构。剧中通过自我实现的个人叙事、都市时尚符号以及艺术职业设定, 鲜明地张扬了女性的主体性; 但这种表达陷入了新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困境——用个人成功的故事掩盖了社会普遍存在的性别不平等现象, 反映出消费主义与女性赋权之间的关系。本研究旨在为中国女性题材创作提供批判性的思考参照。

关键词: 现代性; 女性意识; 社会话语; 《玫瑰的故事》; 个体化

收稿时间: 2026年4月2日

中图分类号: G302

通讯作者: 冯青青, 四川传媒学院

The Expression of Social Discourse and Female Consciousnes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odernity: A Case Study of The Story of Rose

Feng Qingqing

(Sichuan University of Media and Communications, Chengdu, Sichuan 611745)

Abstract: Contemporary TV dramas centered on women's experiences serve as significant cultural texts for observing the evolution of societal gender norms. 《The Story of Rose》, tracing the growth journey of urban female protagonist Huang Yimei, presents current modes of women's self-expression and consciousnes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discursive construction of the drama from three perspectives: narrative mode, bodily representation, and professional imagination. Through individualized narratives of self-actualization, urban fashion signifiers, and artistic occupational settings, the drama prominently asserts female subjectivity; yet this expression falls into the trap of neoliberal feminism—using stories of individual success to obscure socially pervasive gender inequalities, reflecting the complex relationship between consumerism and female empowerment. This study aims to provide critical reference for the creation of women-themed content in China.

Key words: Modernity; Female Consciousness; Social Discourse; The Story of Rose; Individualization

一、引言

近年来, 国产女性题材影视作品呈现井喷态势, 从《三十而已》到《我的前半生》, 都市女性成长叙事持续引发社会热议。女性题材电视剧的

“她意识”审美呈现, 不仅是对女性个体生命经验的关注, 更是对女性群体生存境遇的深层思考。2024年的热播剧《玫瑰的故事》更以现象级传播成为焦点, 其改编自亦舒同名小说, 通过女主黄



亦玫二十余年的情感与职业经历，构建了成为自己的女性成长故事^[1]。该剧的高话题度不仅源于明星效应，更在于其精准触动了当代都市女性的身份焦虑与自我期待，成为观察社会性别观念变迁的重要文化载体。

在收获市场成功的同时，该剧也引发了学术界的不同评价：一部分人认为其是女性主体意识的突破性表达；但也有少数声音指出，其深陷消费主义与个体成功学的意识形态陷阱。在现代社会，个体从传统的集体束缚（如家庭、宗族、宗教、国家等）中逐渐解放出来。在个体化时代，女性意识如何通过社会话语建构？这种表达又体现了怎样的现代性特征与内在局限？本文以现代性理论为分析视域，从叙事、身体、职业三个维度分析该剧的话语建构策略，旨在揭示其女性意识表达的现代性悖论。

二、《玫瑰的故事》的话语建构分析

（一）叙事话语：成长轨迹的个体化建构

《玫瑰的故事》呈现了黄亦玫20岁到40岁的人生历程，“亦玫”即“也是玫瑰”，既是美的象征，又是带刺的植物。这种美丽的危险恰是女性气质的隐喻，也是剧名的一语双关。相较于《红楼梦》黛玉葬花色衰爱弛的古典悲剧，到张爱玲笔下蚊子血与饭黏子对玫瑰神话的解构，从韩国《黑暗荣耀》以文东恩的无花状态拒绝审美化规训，到日本《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以廉价玫瑰的贬值暴露出社会阶级性，几乎都体现着花谢人亡的古典宿命。

而《玫瑰的故事》重新建构了玫瑰永恒绽放的现代执念，花的生命周期从无可挽回的凋零转向拒绝衰老的优化。40岁的黄亦玫仍被年轻男性爱慕，四段情感经历构成其自我认知的递进阶梯。与原著相比，电视剧强化了“成长”主题，每段关系都被赋予了明确的功能定位，电视剧改编通过增加职场戏份和强化情感主动性，使黄亦玫的形象从原著的被动承受者转变为主动选择者^[2]。初恋庄国栋象征理想主义的幻灭，与方协文的婚姻代表向现实妥协的困境，灵魂伴侣傅家明指向稀缺的精神共鸣，年下恋何西则暗示自我完整后的从容。这种叙事将女性成长编码为试错——反思——进阶的线性进程，契合当代社会中的进步意识形态。剧中采用了第一人称独白与全知旁白交织的叙事，

形成自我剖析的话语效果。呈现人物的主观视角，增强观众的带入感。“从此，世界在我面前，指向我想去的任何地方”等金句，将女性觉醒表述为个体意志的胜利，遮蔽了阶级、代际等结构性因素的作用。基于类型的性别叙事与资本逻辑相互纠缠，女性成长故事往往被编码为可消费的励志神话。这种自我负责的叙事逻辑，正是新自由女性主义的典型表征^[3]。

（二）身体话语：颜值经济与中产美学

视觉文化中的女性身体始终处于被观看与自我观看的张力场中，这种双重性构成了现代性别政治的基本悖论。作为视觉媒介，剧集通过高度风格化的着装建构了主角的性别身份^[4]。黄亦玫的服饰造型随人生阶段精准变化，她的衣橱不仅是个人品味的展现，更将不同阶段的人物状态可视化。从青年时期饱和度极高的如明黄、正红、宝蓝等色彩，到婚姻阶段的如灰调、驼色、藏青的黯淡保守，再到职业期简约干练的黑白灰和廓形剪裁，最终抵达成熟期，通过低饱和度莫兰迪色系及高质感面料展现人物状态的优雅从容，每一阶段的人物着装都精准对应着其社会身份的转换与心理状态的变化。剧中通过时装叙事完成了角色塑造，更在无形中绘制了一幅都市中产女性的理想生活图谱，召唤观众对其生活方式的认同与向往。

然而身体的视觉化呈现始终面临被观看的悖论。当代女性剧集中，中产美学与颜值经济形成合谋，女性身体既是赋权符号也是消费对象。这一悖论在主演刘亦菲身上体现得尤为尖锐。剧中多次通过主观镜头模拟女性视角，尝试打破传统性别权力关系，或通过镜像场景构建女性的自我凝视，但这些镜头设计在整体叙事中显得杯水车薪^[5]。大量面部特写、慢镜头跟拍、光影雕琢的身体展示，本质上仍服务于消费主义的视觉逻辑，身体（脖颈线条、手指姿态、步态韵律）被拆解为可供品鉴的局部，成为流通于屏幕间的视觉商品。作为具有广泛文化符号价值的明星，刘亦菲既是剧中女性反抗男性凝视的叙事武器，也是平台引流、品牌植入、话题营销的核心商业资产。这种双重性揭示了当代女性题材创作的基本困境：女性身体既是赋权的场域，也是资本增殖的工具。此外，剧中对身体管理的美化叙事，被赋予了自律



即自由的积极意义,健身房的汗水、护肤台的瓶罐、衣帽间里的搭配实验,这些自我管理细节被反复呈现。却悄然遮蔽了一个关键事实:女性在外表维护上投入的大量时间、金钱与情感劳动,本质上是一种性别化的无偿或低偿劳动。当剧中将黄亦玫的光鲜形象归因于个人努力与品味时,它回避了谁为她承担了育儿与家务的隐形劳动,她的从容是否建立在某种阶层特权之上等一系列问题。将结构性不平等转化为个人自律美学的叙事策略,正是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在性别领域的典型运作方式。系统性的压迫改写为可消费的励志故事,使观众在审美愉悦中完成对既有权力秩序的再确认。最终,《玫瑰的故事》的身体话语呈现出一种矛盾的现代性,既试图通过视觉革新推动性别观念的进步,又不得不屈服于流量经济与颜值政治的底层逻辑;既展现了女性身体的自主性与多样性,又将这种自主性重新编码为可展示、可模仿、可消费的中产生活样板。这种张力本身,或许正是当代中国女性题材创作最真实的文化症候。

(三) 职业话语:公共领域的有限参与

《玫瑰的故事》将黄亦玫设定为策展人,这一职业选择精准击中了当代都市青年的职业想象:自由、开放、有品位、能够将工作与生活美学无缝融合。策展人这一职业设定巧妙地规避了真正尖锐的性别议题,以创意阶层的理想图景替代了对结构性不平等的追问^[6]。类似设定在影视剧中屡见不鲜:《三十而已》的顾佳是茶厂老板兼全职太太,优雅游走于商场与家庭;《我的前半生》的唐晶是咨询业高管,独立精致却最终为爱情让路;《都挺好》的苏明玉是销售总监,靠个人能力逆袭成功。这些理想女性角色的共同点在于她们的职业自带体面感,既摆脱了传统职业的性别标签,又无需直面制度性的性别困境。艺术策展、茶艺师、画廊主等职业被过度呈现,形成了对当代知识女性职业选择的单一化想象。这些职业被精心挑选,正是因为其能够表演性地展示性别平等,女性可以如此光鲜、成功,仿佛传统的性别分工早已成为历史,而真正存在严重性别不平等的传统领域却被系统性地排除在镜头之外^[7]。

剧中黄亦玫遭遇的职场困境,怀孕后被边缘化,她选择策划一场大型展览来证明自己的价值,

最终以个人才华赢回认可;遭遇职场性骚扰,她以辞职创业优雅脱身。这些情节看似解决了问题,实则把原本普遍存在的社会难题,变成了她一个人的奋斗故事。这与现实中女性的遭遇形成反差,怀孕被调岗的女性往往被迫接受降薪或离职,职场性骚扰的举证困难、维权成本高昂,很少能靠个人才华轻松化解。剧中将性别歧视转化为个人能力的考验,将需要集体行动解决的结构性问题,美化为个人机遇与选择,掩盖了劳动监察的消极、司法救济的高门槛、企业社会责任的空洞化等制度性失灵。这种叙事与女性要平衡好事业与家庭的主流话语形成共谋关系,暗示职场不公是个人可以克服的障碍,而非需要制度回应的结构性问题。黄亦玫在怀孕期间策划展览、在育儿间隙保持职业敏感度、在感情受挫后迅速投入工作,这种无缝切换被美化为现代女性的标配,却掩盖了前提条件:是否有足够的经济资本购买育儿服务?是否有家庭支持分担照护?电视剧展示的是一种特权化的平衡,却将其呈现为普遍可达的理想,缺乏育儿支持、反性别歧视机制乏力、晋升通道的潜规则等都被一带而过。

三、女性意识的表达张力与困境

(一) 表达成就:主体性的显性张扬

尽管存在诸多局限,在话语层面《玫瑰的故事》仍实现了突破。社会性别观念的变迁往往始于对主流话语的质疑与反击,这种反击在大众文化领域表现得尤为激烈。黄亦玫的情感历程作为剧中主线,它完成了一次对传统性别脚本的显性挑战,剧中的叙事立场并非隐晦的、需要观众解码的潜台词,而是直白、果敢、甚至带有宣言性质^[8]。在关键情节点上,剧中的主体性表达体现得尤为鲜明。黄亦玫拒绝为初恋庄国栋放弃个人事业发展,在婚姻中发现与方协文的价值观裂痕后果断选择离婚,面对罗德庆的求婚时坚持精神契合高于物质保障的原则,这些抉择共同构成了一套完整的反灰姑娘叙事。它们明确挑战了干得好不如嫁得好的传统性别规训,也不同于早期都市剧中女性角色常见的三种命运模式:要么是无限隐忍、以家庭为重的贤妻良母,要么是在职场与家庭间疲于奔命、最终妥协的绝望主妇,要么是被背叛后黑化复仇的爽文女主。《玫瑰的故事》提供了一种



新的可能性：女性可以既不委屈求全，也不愤世嫉俗，而是始终将自我实现置于人生排序的首位。这种不委屈、不将就的叙事，将女性主体性确立为一种无需辩护、不证自明的价值立场，完成了从女人应该如何到女人想要如何的话语转换。更具传播效力的是剧中的台词设计。“爱情不是生活的全部”、“我要先是我自己”、“时间宝贵，爱够了就立即止损”等金句，以近乎口号式的直白有力，完成了女性主义观念的通俗化转译。它们剥离了学术话语的晦涩与精英主义的疏离，将原本局限于高校课堂、学术著作或小众读书会中的性别理论，转化为可在社交媒体流转、在职场茶水间讨论、在闺蜜聚会中引用的日常语言。其并非思想的矮化，而是一种必要的文化翻译工作，它使得性别平等话语得以突破圈层壁垒，进入大众文化的流通领域，实现了观念的普及化传播。当这些台词成为微博热搜、小红书笔记、短视频剪辑的素材时，它们实际上构成了一种微观的性别政治实践，在娱乐消费的缝隙中，完成了女性主义意识的公共化渗透。

这种表达策略精准回应了当代中国都市中产女性的身份焦虑与自我期待。女性主义意识往往通过人物性格特质得以显现，并在特定的社会语境中获得传播效力。剧集所呈现的职场竞争中困境、婚恋市场上的年龄贬值压力、代际关系中的传统与现代冲突，均与目标观众的经验结构高度契合^[9]。无论是职业转型还是情感决断，黄亦玫的每一次选择，都为观众提供了一面理想的自我之镜，使其在情感共鸣中完成自我认同的建构与强化。这种镜像机制的有效性，在剧集播出期间的海量用户生成内容(UGC)中得到了印证，无数观众在弹幕、评论、二创视频中写下评论，构成了文本与受众之间的互动仪式。从更宏观的文化政治视角来看，《玫瑰的故事》构成了性别意识公共化的有效尝试。它将原本边缘化的女性主义议题女性的身体自主权、情感自主权、职业自主权转化为可在主流平台广泛流通的文化文本，推动了性别平等话语从亚文化圈层向主流舆论场的渗透。这种渗透的意义不仅在于观念的传播本身，更在于它为后续的女性题材创作开辟了话语空间。相较于《蜗居》《裸婚时代》等剧中女性角色对物质安全的焦虑，和

《我的前半生》中罗子君仍需依赖男性导师(贺涵)才能完成职业觉醒的叙事，《玫瑰的故事》中黄亦玫的独立显得更为彻底、更少妥协。这种进步不应被浪漫化，但也不应被否定，它为更具批判性的女性表达提供了基础与参照。推动了性别平等话语从边缘向主流的渗透。

(二) 内在困境：个体化叙事的结构性遮蔽

然而，这种表达深陷新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逻辑陷阱。首先，阶级特权的隐形化。当女性人物被置于“他者”视域下审视时，其个体选择往往被剥离了具体的社会阶级语境，呈现出一种虚假的自主性。黄亦玫的自由选择始终依托于优越的家庭背景与文化资本，父母为清华教授，兄长在建筑行业深耕多年，北京户口与房产构成其试错成本的兜底机制。当她潇洒地辞去工作、远赴巴黎追寻爱情，或果断结束婚姻重新开始时，说走就走的底气并非具有普适性，而是特定阶层位置的特权。剧中对此缺乏自觉反思，反而将阶级优势自然化为个人能力的证明，使独立女性的叙事成为中产阶层的自我确证，遮蔽了底层女性在生存压力下难以做自己的困境；其次，系统性问题的个体化。剧中所有性别困境均被编写为个人情感经历：职场性别歧视被呈现为上司的个人偏见，婚姻中的权力不对等被归咎于遇人不淑，生育焦虑被转化为婆媳矛盾的情感冲突。这种叙事将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私人化，剥夺了结构性批判，使观众在识别坏人的道德快感中，错失对不平等根源的追问。性别话语的渗透往往表现为将结构性问题转化为个人命运叙事，从而消解了集体行动的可能性^[10]。当黄亦玫的每一次挫折都能找到具体的责任人时，系统本身便获得了免责；然后，赋权话语的消费主义^[11]。成为自己的终极指向被悄然替换为消费能力与审美品味的提升。独立女性意味着住得起精装公寓、穿得起设计师品牌、消费得起心理咨询与艺术品投资。女性赋权与消费主义形成意识形态合谋：购买成为表达自我的方式，品味成为阶层区隔的符号，爱自己为持续的消费欲望提供道德合法性。允许女性在私人领域追求自我实现，却回避对公私领域权力关系的根本性质询。

四、结语

《玫瑰的故事》突破传统性别脚本，以个体化



成长叙事实现了女性主体性的显性张扬，在大众文化场域完成了女性主义观念的普及化传播。然而，这种表达深陷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逻辑陷阱，对策展人创意阶层的职业想象，以阶层特权下的选择自由遮蔽普遍性的性别困境，永恒绽放的冻龄神话迎合消费主义审美，独立女性最终沦为可营销的差异性符号。个体化时代，女性题材创作面临文化表达日益丰富、经济制度层面却持续滞后的矛盾现状，剧集的流行恰恰印证了这一悖论：拥有了更多元的女性形象，却未能触及更公平的资源分配；庆祝个体的突围，却回避集体的困境；消费“她力量”的符号，却延迟“她权益”的落实。

未来的创作应当超越对女性的神话叙事，重建个体故事与社会普遍性之间的关联。破单数玫瑰背后的同质性想象，揭示阶级、地域、代际差异对女性的实际影响。当剧集将叙事焦点锁定在都市中产女性的情感纠葛与职业进阶时，农村留守妇女的土地权益、工厂女工的职业病困境、服务业女性的零工不稳定状态、老年女性的贫困化危机，这些构成中国女性生存图景的重要维度被悄然抹除。未来的创作需要呈现复数的“玫瑰”，她们可能是外卖骑手、是护工、是流水线工人、是乡村教师，她们的困境无法通过个人才华或阶层跃升轻易化解，而必须诉诸制度性的保障与集体性的行动。唯有在差异中建立联结，在分化中寻求共识，性别议题的公共讨论才能从可传播走向可改变。

参考文献：

[1] 汤昕. 自我与联结：女性题材电视剧的“她意识”审美呈现与表达[J]. 当代电视, 2024, (03): 18-23+37. DOI:10.16531/j.cnki.1000-8977.2024.03.006.

[2] 孙安琪. 《玫瑰的故事》小说与电视剧中关于女

性自我身份认同的比较[J]. 三角洲, 2025, (17): 62-64.

[3] Ziyue J. Genre-Based Gender Narratives and Capital Logic: A Study of Chinese Female-Themed Dramas [J]. SHS Web of Conferences, 2025, 22001037-01037. DOI:10.1051/SHSCONF/202522001037.

[4] 王蕾. 媒介·权力·性别[M].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8: 293.

[5] 林若冰. “她题材”剧集形象建构与叙事话语研究[J]. 喜剧世界(上半月), 2024, (09): 111-113.

[6] 范智红. 玫瑰的故事：当代知识女性的抉择与成长[J]. 文艺风, 2025, (04): 85-89.

[7] Zixuan Z. An Exploration of the Artistic Image of Female Characters in Chinese Independent Female-Oriented TV Series [J]. SHS Web of Conferences, 2024, 199 DOI:10.1051/SHSCONF/202419902013.

[8] 杜明芮. 社会性别与中国女性意识的觉醒及反击——以抨击“女性堕落论”观点为例[J]. 新闻研究导刊, 2018, 9(21): 49-50.

[9] Li J. The Entail System as Context: Feminist Consciousness Manifested through Character Traits in Jane Austen's Pride and Prejudice [J]. Journal of Sociology and Education, 2026, 2(1): DOI:10.63887/JSE.2026.2.1.25.

[10] 姚凯. 性别话语在现当代文学中的渗透[J]. 文教资料, 2013, (29): 73-74.

[11] 胡敏娜. “他者”视域下雪莉·杰克逊《抽彩》中的女性人物分析[J]. 文化创新比较研究, 2023, 7(26): 18-21.

作者简介：冯青青（1994-），女，汉族，四川成都人，硕士，四川传媒学院融合媒体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视听文化。